

齐鲁人文

■ 不忘初心

他13岁入伍，参加战斗78次，是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并荣立一二等功的军中英雄；23岁因病自愿复员回乡后，

屡屡以突击队员的本色投身地方建设，其平和的内心世界未曾改变——

一等功英雄的心愿：“好好种田”

□ 本报记者 梁利杰 王兆峰
本报通讯员 宋国强

7月16日，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邓集村，我们敲开了一扇挂着“光荣之家”的大门。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英雄邓斌住在这里。

这是一处普通的农家院落，不同的是，在靠近堂屋的窗台下砌了一个大大的花坛，里面绿植茂密，月季、芍药竞相怒放。整个庭院充满了生机。

进了堂屋，室内摆设简陋却整洁有序。邓斌年近九十，须发斑白，面容亦显沧桑，但眉宇间却格外硬朗平和。老人半躺半靠在堂屋的长椅上，见记者到来，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，众人赶紧上前安抚他躺好。

邓斌思路清晰，话语简短有力。聆听他描述那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，虽远隔时空，也足以令人震撼和感动。

一个旧皮包封存戎马岁月

一个褪色的旧牛皮包，封存了邓斌从13岁到23岁整整十年的戎马岁月；

一张斑驳但又字字“千斤”的《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》上的简短文字，是对邓斌义无反顾、舍生忘死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褒奖和致敬；

一枚枚军功章，隐含的英勇付出和无悔岁月，历久弥新，熠熠生辉。

今年4月，定陶区仿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人员崔学军例行到邓斌家走访慰问，并准备采集退伍军人的基础性数据。邓斌说自己的退伍证丢失了，便从一个旧皮包里拿出一张登记表和几枚立功奖章、战斗纪念章，递给了崔学军。

“当我接过这张被揉搓得字迹有些模糊的登记表，看到上面‘参加战斗78次，负伤两次，荣立一等功、二等功……’等字样时，确实被震惊了！”崔学军回忆说。

邓斌的老伴说，这个旧牛皮包平时就随意地挂在墙上。在邓斌心里，都转业到农村了，要这些立功奖章有啥用呢，他并不十分在意。60多年来，除了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成立时，有关部门曾经来邓斌家里要了一枚军功章，作为纪念品存放在馆里外，其他的他就随手放在这个包里，退伍证都不知道怎么丢失了，其他很多立功证明也没有留存下来。

邓斌提供的登记表上详细记录着他的早期档案：1931年7月出生，正排职级，1944年1月3日在本县自动入伍（不到13岁），1947年7月在十一纵

队司令部警卫班入党，1953年6月自愿回乡，入伍前文盲，现在高小文化……在华北五分区司令部警卫班荣立一等功，在十一纵队司令部警卫班荣立二等功。

13岁还是小孩子，为什么这么小就入伍了？据老人回忆，他5岁时就没有了母亲，跟随父亲住在父亲的姥姥家。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姥姥姥家里住着不少从事地下工作的游击队员。那时邓斌家里穷，吃不上饭，游击队员很喜欢他，便经常给他一些吃的。不到13岁的邓斌很快就和游击队员们熟捻起来，有时还机智地帮助游击队员传送文件。后来，他就直接跟着游击队员来到了部队。

从中原到南下广州，从西北、东北到进入朝鲜，这是邓斌十年戎马岁月的足迹。每每忆起早期艰苦的行军日子，老人都忍不住眼含热泪。部队几乎每天都东奔西走，往往一晚上要步行多到120里到180里。邓斌由于年龄太小，身体瘦弱，吃不消这种长期的艰苦跋涉，有时实在跟不上队，领导就把自己的马让他骑，有时也让他从后面拽着马尾巴跟着跑。

入伍后，邓斌一开始只是作为通信员为领导拿拿文件，并没有参加战斗。按照当时规定，非党员不能接触机密文件，因此，入伍三年后，只有16岁的邓斌就光荣入党了，随后任十一纵队司令部警卫班警卫员。

挺身而出，英勇杀敌

一幕幕战火纷飞、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，由于越来越被和平岁月所掩盖，仿佛离我们已很远。但在邓斌老人记忆里，一次次血肉拼杀，前赴后继的战斗依然记忆犹新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菏泽是敌我决战的重要战场。根据中共中央指示，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6年8月挥师到冀鲁豫战场，发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自卫战争，先后组织了包括定陶战役、巨野战役、鄆南战役等重大战役。而历时5天的定陶战役，则是其中一场意义重大又极为惨烈的战役。

老人断断续续回忆道，1946年9月，定陶战役打响，为攻下定陶县城东门北面城墙，邓斌请缨担任第一突击队队长。他带领突击队，翻越城墙和芦苇荡，突袭了敌人的指挥部。攻城中，邓斌不幸被炮弹击中，鲜血染红了衣襟，却依然忍痛炸开城门并顺利发出两颗信号弹，为后续部队发起进攻开辟了道路。据史料记载，定陶战役的胜利，连同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胜利和苏中大捷，对整个解放区的南部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。因表现英勇，邓斌在定陶战役中荣立一等功。

在淮海战役中，我军进攻势如破竹。在攻击到敌人的第三道防线时，遇到敌人的反扑。时任警卫排排长的邓斌，在第二野战军十一纵队参谋长刘星的带领下，冲进敌人的腹地，两人在碉堡中奋力坚持了45分钟……素有“军中好枪法”之称的邓斌拎着两把手枪，挺身而出，英勇杀敌38人，为开辟总攻赢得了宝贵时间。这次淮海战役邓斌荣立二等功。

冲锋的号角，英勇的拼杀，每一次战斗都是以死相搏，每

一处战场都是血肉长城。

邓斌老人回忆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原地区乃至鲁西南地区时常打运动战。记忆中，天天在打仗，饭也顾不上吃；睡觉时，子弹打在屋里的墙壁上；行军时，身边的战友跑着跑着就倒下了。

“为了顺利攻城，我在敌人眼皮底下偷挖了一条地道，推着一箱材的黑火药在地道内引爆，炸毁了城墙……”

“在强渡黄河时，水流把绑在一起的木板冲散了，我落入了水中，万幸紧紧抓住了马尾。等到了对岸，身上的背包和衣服都被冲走了，背包里的立功奖章和简历都没有了……”

新中国成立不久，邓斌又跟随部队来到朝鲜战场。在朝鲜战场的一年半时间，他担任军需物资运输科长。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是“没有一分钟听不见敌机在头顶上飞过”。当时朝鲜战场上汽车非常少，全靠马车来运输物资，由于敌机密集盘旋，他们一般都选择晚上运输，而且不敢点明火。即便如此，战友们的伤亡依然很大。每回忆到一处场景，老人都闭目沉思，然后叹息一声：“不说了，说这些干啥呢，我的很多战友都不在了。”

正是在朝鲜战场上，邓斌不幸患上了肺结核，领导几次问候他的病情，甚至一度考虑要把他送到苏联去医治。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后，为了不给党组织添麻烦，邓斌提出了自愿复员回乡的申请。

回乡依然保持“突击队员”本色

1953年6月，刚满23岁的邓斌复员回到了家乡定陶县邓集。

邓斌的大儿子邓鲁陶说，除了身体患病的原因，父亲复员回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里爷爷的牵挂。邓斌是家里的独子，上面有三个姐姐，自13岁离家后，一直没有音信，老人想念儿子眼睛都哭瞎了。这也坚定了邓斌回乡的决心。而在登记表上，他只简单签了“好好种田”四个大字。此时，在即将复员的邓斌的内心世界里，认定“把地种好也是给国家作贡献”。

然而，回乡后的邓斌并没有履行自己“好好种田”的承诺，因为当时村里文化人少，他几乎一回村就被当地政府委任为村治保主任，带领村里挖沟修渠搞农业生产，没有一天待在自己家里种田。由于邓斌把村集体的财产和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，所以深得当地政府领导和村民的信任。自此，一项项堪称突击队的任务，陆续委派给了邓斌。

到枣庄组建钢铁厂，是邓斌回乡后接到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。他一头扎进工作里，处处身先士卒，日夜加班加点。钢铁厂步入正轨时，邓斌谢绝了上级领导的重用，坚持回到村里。

后来，当时的邓集公社组建窑厂、地毯厂，再次让邓斌去负责。而无论在哪个岗位，邓斌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完成工作，更无一例外地，每次这些厂子步入正轨后，他就又退出回到村里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邓斌又受当时的邓集乡委派组建乡敬老院。组建之初，邓斌每天几乎24小时投入到工作中。老伴在一旁透露，为了给敬老院的孤寡老人改善伙食，他常常把自己地里种的地瓜、南瓜等都拿到敬老院。直到2010年，79岁的邓斌从敬老院院长岗位上退休，回到了家里。

由于是自愿回乡，邓斌当时没有领取国家一分钱，更没有要求组织为自己安排工作。回乡后的身份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。而回乡后投身地方建设46年，其农民身份依然没有改变。而他从邓集乡敬老院退休后，每月也只领取100元的生活费。

为什么遇到突击队的工作都爱找他？仿山镇邓集村党支部书记、今年65岁的邓学科道出原委：“他办事沉稳，遇事从不急躁，耐心做各种复

杂工作。再加上性格平和，淡泊名利，深得上级组织信任。”

“更难得的是，以他几十年来的工作表现和资历，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成企业职工或机关干部身份，但他从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去麻烦组织。不仅如此，现在村里各项工作，邓斌也都处处带头，在前期土地调整过程中，邓斌家三个孩子都没有分到地，但他坚决阻止家里人去找村主任，不给村里添一点麻烦。”邓学科感慨道。

邓斌原来的领导，也就是在他13岁时带领他参军的游击队长刘星，离休前官至副省级（享受正省部级待遇），曾多次写信给他，希望邓斌继续到他身边工作，但邓斌婉拒了领导的好意。

目前在邓集村，虽然很多村民大都知道邓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但几乎没人知道他具体打过什么仗，除了偶尔对自己的孩子讲过外，邓斌对外人不多讲一个字，荣立一、二功的事迹更是没有外人知道。

为国家贡献是应该的

邓斌的大儿子邓鲁陶多次向记者表示，父亲这一辈子非常知足，他是家里的独子，却生养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，有生之年儿孙满堂，他常对子女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军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再提那个做啥？我本来就是个农民，当年战场上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，我幸运地活下来了，现在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幸福。”

儿女再清楚不过了，父亲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“自立更生”，他是这样做的，也是这样要求子女的。“回乡后领导让去哪里，我坚决服从，这么多年我都是为大家干，不图钱，不图官，所以从没后悔过。”邓斌对记者说。

邓鲁陶小时候就知道，父亲的淡泊名利充分体现家庭中。

邓鲁陶有四个弟弟、两个姐妹，随着他们长大，慢慢注意到家里墙上挂着的那个牛皮包，而牛皮包里各种沉甸甸的纪念章，成了他们争抢的玩具。顽皮的孩子哪里知道，这些是父亲十年戎马生涯珍贵的见证物品。

邓鲁陶说，他清晰地记得，经常领着几个弟弟从包里偷拿纪念章去换糖吃。至于玩丢的，他已记不清了。

邓鲁陶是邓斌儿女中第一个参军入伍的人。早在1978年，高中毕业后的邓鲁陶就从家乡定陶县入伍，1979年即到前线投身了战斗。1993年，转业到广州市花都区工商局任职，直到今年退休回家。

得知大儿子参军第二年就去前线的消息时，与别的父母哭闹的表现截然不同，邓斌只是淡定地对儿子说：“我有5个儿子，为国家贡献一个也是应该的啊。”听了父亲的话，邓鲁陶一度感慨不已。

目前，邓斌在家人的照顾下精神状态良好，基本生活能够自理。虽然家庭不富裕，他仍然不忘国防，心系部队，鼓励自己的儿孙们参军入伍。

老人的口头禅是：“我们家男孩多，就应该多人历练下，就应该多为祖国作出贡献。”儿子邓鲁陶，女婿王喜成，外甥刘勇，外甥媳马娟，孙子邓猛、邓占胜、邓胜龙均到部队服役，儿孙们在部队期间都多次荣获嘉奖及三等功。其中邓胜龙在2012年参军入伍，目前在河南开封空军后勤服役，二级士官，2016年荣获个人三等功，多次荣获嘉奖和先进个人、优秀士官等荣誉称号。

或许孙子邓胜龙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缘故，格外受到爷爷的疼爱。邓胜龙高中毕业参军后，邓斌每次都不忘叮嘱他，在部队要好好干，争取多立功。

记者临走时，老人坚定有力地说：“等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时，我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！”

■ 齐鲁名士

马秋仪： 山东最早赴日 女留学生

□ 鲍青

马秋仪，清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生于栖霞亭口镇马家窑村。她原本有个颇显“男子气概”的名字——马肃贞。

马家为当地书香门第。马秋仪的父亲马桂芳于光绪三年（公元1877年）考中进士。三年后，马桂芳署理台湾宜兰县知县。他赴任台湾时，将爱女马肃贞带在身边。

马桂芳在宜兰施行教化、兴办教育，得到百姓交口称赞。马肃贞随父寓居台湾三年，遍览海疆形胜，眼界大为开阔，故而思想开化，颇有主见。

光绪三十年，马肃贞与栖霞人谢鸿焘结为夫妇。两人志同道合，皆向往新学，关注救亡图存、国家富强之道。

当时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，鼓励青年人赴日留学深造，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经验。

思想素来开明的马肃贞，因而鼓励丈夫，和自己一起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。马肃贞东渡扶桑后，成为山东最早的赴日女留学生。

到达日本后，他们迅速接触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，夫妻二人积极联络革命志士，先后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。

中国同盟会成立后，马肃贞与谢鸿焘随即加入。马肃贞更与革命家秋瑾相识，并结下深厚情谊。

1905年，日本颁布《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》，禁止清朝留学生参与政治活动。秋瑾建议中国留学生以罢课相抵制，并呼吁大家回国革命。马肃贞积极赞成秋瑾的主张。为表敬慕之情，她将自己的名字“肃贞”改为“秋仪”。1905年底，她与丈夫回到烟台。

归国后，马秋仪在烟台与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人设立同盟会支部，创办东牟公学，积极传播新思想。

1907年，徐锡麟、秋瑾领导的安徽巡警学堂、浙江大通学堂起义失败，清廷随即加紧对新式学堂的监视。山东巡抚端方明知烟台革命党人活动频繁，立即派人查封东牟公学，并令烟台官立速捕公学教工。谢鸿焘、马秋仪被迫出走避难。

1911年秋，山东巡抚孙宝琦先是宣布山东独立，不久又宣布取消独立，山东革命形势晦暗不明。马秋仪积极联络革命志士，共同倡言继续革命。她还教导两个女儿投身革命事业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，烟台军政府随即成立。但在一穷二白的民国初年，军政府财政拮据，时时捉襟见肘。马秋仪发动女儿们组织运动来筹集资金。在她的动员下，胞弟马宝麟变卖一处庄宅和耕地数百亩，以作支援新军之用。

后来军阀混战，国是日非，革命陷入低潮。而马秋仪与丈夫谢鸿焘也年过四旬，自感年岁日增，无力回天，颇觉灰心失望。夫妻二人决定投身慈善事业，从身边点滴善事做起。每次大灾曾撰文称赞她：“夫人初适先生时，资装甚备，后设学校及谋倡议，皆斥卖田宅以奉之。光复事成，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。”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烟台很快沦为敌占区。日本人闻知谢鸿焘的声望和留日背景，便策划让他复出主持烟台局面，并许以高官厚禄。马秋仪的后人介绍说：“抗战伊始，马秋仪与谢鸿焘已年逾花甲，家庭经济来源基本断绝，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拮据。但谢鸿焘仍保有民族气节，任凭日本人如何软硬兼施，也绝不答应，并装出一副老态龙钟、十分虚弱的无能样子。从此马秋仪与谢鸿焘不问政事，只在房屋周围种菜、养鸡，靠变卖衣物来熬过艰难的抗战岁月。”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马、谢全家迁居上海，后来又定居苏州。1954年，81岁的谢鸿焘去世。1960年，90岁的马秋仪逝世于苏州。

■ 政德镜鉴⑩

林则徐虽然任职东河河道总督时间不长，但忠于职守、兢兢业业，“整个河务风气大变”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从此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治水名臣之路。

林则徐：治河能臣由山东起步

□ 鲍青

留在后世人们眼中，林则徐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，是在广东无惧列强，查禁鸦片、虎门销烟的英勇壮举。

其实在虎门销烟之前，他就是大清闻名朝野的治水能臣。而他真正善于治水的名声，则是在历时共计164天的东河河道总督任上开始的。

在上任东河河道总督之前，林则徐曾在湖北任职，也负责过防御江汉平原水灾。但此时的他，更多的是贯彻上官意图，起辅助性作用。

到了道光十一年（公元1831年）十月初七，朝廷擢升时任河南布政使林则徐为东河河道总督。

东河河道总督的首要职责是修筑河南、山东堤防，保障经过该地区的漕船顺利通行。此时的山东境内有运河流经，河南境内有黄河通过，两省自元代以来就是国家内河治理的重点和难点。为了使黄河安澜、运河畅通，清政府每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对黄运堤工、坝工、埝工进行维修与管理。东河河道总

督坐镇济宁，全权指挥两省各要地的下属官僚，协调河道部门与地方机构关系，确保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能顺利入京。

东河河道总督管辖区域水文多变，灾害频发，是责任重大的苦差事。林则徐虽然是干练有为的能臣，但对自己能否挑起如此重担也没有多少把握。他自度“河工修防要务，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，总督必须能运筹帷幄，统一筹划”。而自己对河工并不熟悉，对河防形势也不了解，一时间恐怕难以胜任。何况到了清朝中期，河务成为贪官钻营的巢穴，要根本杜绝其中弊端，无异于壮士断腕。林则徐对自己能否肃清腐败，也没有充分的信心。

所以林则徐以自己谙熟河务为由，上奏请求朝廷另选他人。但道光帝对林则徐历来政绩非常满意，对他充满信心，认为他“出膺外任已历十年，品学俱优，办事细心可靠”。道光帝在收到林则徐请辞的奏折后，非但没有改变主意另择他人，反而下谕令催促林则徐迅速赶赴新任，不得再推辞。

道光帝还特地谆谆训诫，付以林则徐扫清积弊的夙命：“一切勉力为之，务除河工积

习，统归诚实，方合任用尽职之道，朕有厚望于汝也。慎勉毋忽。”林则徐接到皇帝的谕令后，即从江苏扬州勘灾途中赶赴山东，在济宁接任东河河道总督。

林则徐十分感激道光帝的一再勉励，向道光帝表达决心：自己要“力振因循”“破除情面”，“自持刻苦，不避嫌疑，以防意者防川，以纠心者纠吏”，努力整顿河工的积弊，以达到“弊除弊节，工固澜安”的目的。

林则徐到达山东任职后，便雷厉风行地开展治河工程。他时常亲自顶着寒风，步行几百里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高梁秸进行检查，还查看沿河地势，水流情况。

除了常规治河外，林则徐还萌生了永除水患的想法。嘉庆道光年间，黄河治河局限堵口筑堤，总是在细节上小修小补，往往只是勉强支撑数年而已。林则徐经过实地调查，认为若改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海，可以克服河患的巨大威胁。他指出：欲救江、淮连年淤塞决口的困局，必须改变黄河水道，改由山东入海。这样江浙的漕米运输可以快捷许多，而运费也可以降低不少。

的经验，迅速在江苏境内开展治水工程。在他呕心沥血付出之下，江苏境内堤坝得到巩固，防御洪水的能力大大提高。

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后，又面临江汉平原水患频发的难题。他初来乍到，就对湖北防汛抗洪忧心忡忡。在给同僚的书信中，他焦虑地说：“久雨令人愁绝。”“薄堤似纸，不知如何御过夏秋也。”

梅雨季节，江汉一带天阴多雨，更让他寝食难安。为了防御洪水，林则徐冒着暴雨巡查沿岸大堤，督促河工加固河堤。调查中，林则徐发现堤内一处发生渗水，居民惊慌失措，四散逃离，形势非常危险。林则徐经过仔细查看，凭借自己治水多年的经验，断定大堤暂时不会发生决堤。他一边“谕居民不必惊悸”，一边和官员“搯土束薪，尽力守护”。经过官民齐心协力，大堤终于转危为安。

此外，林则徐还认真督修防洪堤埝，制定修堤防汛章程，疏浚淤塞河道、筹措防汛专款，尽一切力量保障江汉平原的安全。经过他细致有效的努力，素来易发生水灾的江汉平原，在他任上竟然始终安然。道光十八年秋汛，江、汉洪水并涨，“江汉数千里长堤，安澜普庆，并支河里堤，亦无一处漫口，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”。

林则徐卓有成效的治水成绩，不仅受到广大百姓的赞誉，也得到道光帝的褒奖。道光帝在林则徐的奏折中，亲笔朱批道：“凡事若能如是，有何不可挽回者？朕意在言外，卿其善体朕心，决意勉之。”

一直到鸦片战争负罪后，林则徐也曾戴罪在河南负责治理黄河决口，并受到百姓的欢迎和爱戴。